

迪·努·艾地

勇敢,勇敢,再勇敢!

一九六三年二月十日在印度尼西亚共产党
七届一中全会上的政治报告



人 民 出 版 社

迪·努·艾地

勇敢,勇敢,再勇敢!

一九六三年二月十日在印度尼西亚共产党
七届一中全会上的政治报告

人 民 出 版 社

一九六三年·北京

D. N. Aidit
BERANI, BERANI, SEKALI
LAGI BERANI!

根据一九六三年二月十一日印度
尼西亚《人民日报》译出

迪·努·艾地
勇敢,勇敢,再勇敢!

*

人民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阳门大街320号)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登记证出字第1号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

开本 850×1168 毫米 $\frac{1}{32}$ · 印张 $2\frac{1}{8}$ · 字数 45,000

1963年3月第1版

1963年3月北京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 3001·725 定价 (45) 0.20 元

目 录

一、政权必須同要建立的經濟結構相适应	3
(一)关于巩固已經取得的胜利的任务	4
(二)关于克服經濟困难的任务	8
(甲)关于国家財政	8
(乙)关于生产	11
(丙)关于对外貿易	18
(丁)关于人民的生活費用	20
(三)反对新殖民主义的任务	23
二、加强国际反帝統一战綫,加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	36
三、改进领导方法,并有計劃地开展工作,繼續前进	50

亲爱的同志们！

中央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是在一九六二年四月我党第七次（特别）全国代表大会后的十个月举行的。这个具有历史意义的代表大会阐明了在当时需要阐明的在政治上、组织上和思想上的所有问题。由于我们对所有这些问题的看法一致，在这十个月以来，而且在今后，我们党能够大踏步地前进。正如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所要求的那样，我们党在高举**民主、团结和动员**三面民族的旗帜方面，在继续进行党的建设以及完成所有国内和国际的任务方面，都真正作到了一个思想，一条心，一个目标。

面临着因西伊里安问题而可能和荷兰殖民主义者发生战争、为了恢复治安而动员群众以及在防止因官僚资本家的腐蚀作用而引起经济方面的总崩溃的日益高涨的人民斗争中，共产党人队伍和人民的思想一致已经起了非常积极的作用。在高举民族的三面旗帜的同时，我们在**一手拿枪，一手拿锄**的统一意志下正在并将继续不断地开展斗争。这就是说我们一面随时准备打击革命的敌人，一面准备发展生产。

由于正确的路线和统一的意志，印度尼西亚人民在沒有同荷兰殖民主义者进行全面战争的情况下，胜利地执行了人民的三项命令。荷兰殖民主义者在还没有进入战场前，就被迫退却了。与此同时，国内的反革命叛乱分子基本上已经肃清。这一切胜利的取得，是由于人民已成功地争取到一定程度的民主，成功地加强了以“纳沙贡”^①为核心的民族统一战线，并且在一定程度上成功地

動員了我們民族內部一切革命的潛力，特別是在人民的全力協助下動員了武裝部隊中的愛國力量，同時也贏得了社會主義國家和世界上其他新興力量的援助和支持。

沒有任何一種力量能夠阻止已經起來了的群眾。他們不僅將完成解放西伊里安的鬥爭和恢復治安，而且將掃清一切阻擋人民革命運動的障礙，——如緊急狀態（戰時戒嚴法令），官僚資本家、買辦和地主，總之，所有反對《政治宣言》和反對以“納沙貢”為核心的民族互助合作的那些人——而繼續前進。

目前擺在我們面前的三項實際任務是：第一，鞏固已經取得的勝利；第二，克服經濟困難；第三，反對新殖民主義。

只有我們繼續堅決高舉民族的三面旗幟，在執行這些任務時把黨的建設任務和國際任務結合起來，這三項國內任務才能很好地貫徹執行。

當我們對國內任務、黨的建設任務和國際任務都明確了之後，緊跟着我們還必須**敢想、敢說和敢做**。

我們已經把一九六三年規定為“勇敢年”。這和蘇加諾總統向印度尼西亞人民提出的以敢于冒險的精神過生活的號召是相符的。把今年稱為“勇敢年”，這是極其符合人民的願望的，他們希望千百萬人民群眾隊伍的先鋒隊能更勇敢地領導他們。也正因为如此，我們才把這個政治報告題為“**勇敢，勇敢，再勇敢！**”。

同志們，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和這次中央全會之間的時期內，我們失去了我們親愛的**蘇哈迪**和**沙爾米迪·烏達爾約**兩位同志。讓我們大家起立，靜默志哀，向他們為了人民和印度尼西亞共產黨的偉業而作出的所有貢獻表示我們的敬意和感謝。

① “納沙貢”是印度尼西亞文“民族主義者、宗教界、共產主義者”的縮寫。——譯者注

一、政权必須同要建立的經濟結構相适应

同志們！

在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所提出的“爭取民主和爭取成立互助合作內閣”的口号鼓舞下，在向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所作的总报告中提到，“目前我們对内政策的十分重要的問題是高举民族的三面旗帜，即民主、**团結和动員**，以走向在政治制度和在人民的政治自由方面进行彻底的民主改革。具体地說就是走向：**成立‘互助合作內閣’，撤銷緊急状态，以及重新考虑現行的緊急状态法令。**”到目前为止这个結論仍然有效，因为在最近十个月內我們所取得的成就还没有超出这个政治任务。

工作內閣成立以来，包括調整以后的時間在內，到現在已三年半了。这个內閣的政綱称为三項政綱，即：（一）向人民提供足够的衣食；（二）保护国家和人民的安全；（三）繼續进行从經濟上和政治上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西伊里安）。

政綱的第一項完全沒有实现；政綱的第二項已經部分实现，这是由于“印度尼西亚共和国革命政府—全面斗争約章”集团和伊斯兰教国运动—印度尼西亚伊斯兰教軍等反革命叛乱分子已經被击败了，但这并不是說，人民和国家已經得到安全；政綱的第三項也已經部分实现，这表现在根据正式協議西伊里安即将移交給印度尼西亚共和国，但这并不是說，在經濟和政治方面，特别是在經濟方面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已經結束。

苏加諾總統把一九六二年八月十七日的讲话題为“胜利年”是正确的，因为西伊里安問題的解决和反革命叛乱集团的被肃清，的

确是巨大的胜利，但这并不是說政綱的第二和第三項已經實現了。因此苏加諾总统还強調說，已經取得的只不过是胜利的**开端**。

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人必須深刻地認識到，我們所取得的胜利只是初步的胜利，或者更确切地說，这样的胜利还不保險，还不穩固。尤其是我們想到向人民供应足够的衣食并沒有实现，人民的衣食甚至越来越困难，而且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無論在西伊里安或者在我們共和国的其他地区，仍然在自由活动。

由于这些原因，我們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人在迎接“**胜利年**”时，肩負着三項最緊迫、最实际的任务，即第一，**巩固已經取得的胜利**；第二，**克服經濟困难**；第三，**反对新殖民主义**。

我們执行上述三項任务，是同执行归納为党的三面旗帜的党的总路綫分不开的，是同在执行党的总路綫过程中出現的重要的和有决定性的任务，即归納为民族的三面旗帜的任务分不开的。为此我們提出了“**高举两組三面旗帜执行三項任务**”的口号。

三項任务是目前局势发展所产生的所有实际任务的概括。为了推动我国的政治发展，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人必須認真地完成这三項任务，因此我們需要比較詳細地談一談这方面的問題。

(一)关于巩固已經取得的胜利的任务

为了巩固我們已取得的大胜利，我們必須毫不懈怠地加强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在西伊里安的力量，以便尽快地把西伊里安收归印度尼西亚共和国的版图，以便使它不致于变成新殖民主义的控制地区，不致于被帝国主义者变为自由进行投資的場所，結果使帝国主义一旦认为有必要时就能借口“保护他們在該地区的財產”而派遣軍隊到那里去。那就將意味着西伊里安將再次变为一支对准着印度尼西亚共和国的手枪，但这时就已經不是腐朽了的荷兰殖

民主主义者的手枪，而是侵略性和掠夺性最强而又最蛮横的美帝国主义者的手枪了。

令人十分高兴的是，西伊里安的印度尼西亚儿女在解放西伊里安斗争的现阶段中，积极地起来要求尽快地使西伊里安回到印度尼西亚共和国的管辖下。这也是在反对西伊里安的新殖民主义斗争中的一支不可缺少的力量。

在巩固治安的成就方面，进步人士，特别是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人必须把治安问题当作是自己的问题，因此必须和负责治安的有关方面进行良好的合作。一九六二年十二月十九日苏加诺总统在泗水纪念“人民的三项命令”发布一周年的大会上，宣布取消紧急状态。取消紧急状态并不是说让我们在安全方面减弱我们的警惕性，使反革命分子有机会进行活动。相反地，取消紧急状态必须进一步提高我们对反革命分子的警惕性，同时必须给人民以自由，使人民无论在提高生产方面或者在打击反革命方面能够发扬战斗精神，卷起袖子行动起来。

为了剥夺人民在取消紧急状态以后将获得的民主，官僚资本家和其他反革命分子正在竭力准备采取一系列的步骤。过去，他们早就企图通过保持地方上的“政、军、警、法四位一体”的独裁统治，把他们的爪牙派到乡村去实行控制，为了夺取已有的民政机关的职权而建立他们自己的机关等等严重地破坏民政机关所建立的秩序的办法，以便实现没有战时戒严法令的战时戒严状态。右翼社会党人为了实现没有战时戒严法令的战时戒严状态，尽力散布他们的反动的建议。这是和首席部长哈吉朱安达工学士一九六三年一月二十一日在梭罗举行的全印度尼西亚省长会议的致词中所发表的声明相违背的。他在这个声明中明确指出：“从一九六三年五月一日起，将正式取消最高战时掌权者和地方战时掌权者，同

日，中央和各地方的权力将全部交还给民政机构……地方长官在他的地区内行使政权和维持治安的权力。这就是说，为了维持本地区的公共秩序和安全，在现行法权范围内，地方长官有权制定政策和基本路线，官方或非官方对此都必须遵守和重视。”

一切民主和爱国力量不能犹豫和后退，相反地必须敢于阻止旨在实现没有战时戒严法令的战时戒严状态的企图。总之，当战时戒严状态取消之后，我们必须认真地和全面地实现苏加诺总统所说的“《政治宣言》指导枪杆子”。

为了使紧急状态的取消真正地给革命活动带来自由，同时使人民的创造力得到解放，而不是给反革命分子以方便，我们党认为成立有“纳沙贡”参加（不是作为核心）的协助革命领导协商机构是有积极的一面的，这个机构可以协助苏加诺总统在没有战时戒严状态的情况下行使最高职权以完成现阶段的革命。

我们必须巩固的另一个巨大胜利是民族阵线。尽管它经常遭到国家机关本身的“留难”和“束缚”，我们仅仅在两年的时间内就成功地建立了民族阵线，其成员包括一切凡是接受《政治宣言》的政党、群众团体和武装部队。这是在加诺兄领导下以“纳沙贡”为核心的民族互助合作的一个伟大胜利。这再一次证明：只要哪里有以“纳沙贡”为核心的民族互助合作，那里就不出乱子。但是这并不是说我们就不要进行反对冒牌的《政治宣言》支持者的斗争。

当反动分子破坏民族阵线不能得逞之后，他们继续在散布解散一切政党而把民族阵线变成独一无二的党这样的思想，以便捣乱。他们不仅要危害政党的生存，而更主要的是想破坏民族阵线本身，因为他们知道，民族阵线得以迅速发展的原因是存在着各政党和群众团体之间的良好合作。

维护民族阵线是同维护政党制度分不开的。我们在民族阵线

中團結起来，就是为了在执行共同綱領，即《政治宣言》时團結起来，并不是要把不能溶化在一起的东西溶成一体。

关于这一点加諾兄曾經很正确地說過：“我們不是要民族主义者改变他們的思想信仰变成伊斯兰教徒或者变成馬克思主义者，也不是要馬克思主义者或者伊斯兰教徒变成民族主义者，我們所希望的是这三派能够和睦相处和團結起来。”（《在革命的旗帜下》，第5頁）

加諾兄在他的《实现印度尼西亚的独立》这篇文章中写道，必須要有一个真正的先鋒党，他还进一步解釋說：“还可以有其他政党……不当指揮官，……而只当僚佐……”由此可見，加諾兄的思想是和希特勒或墨索里尼及其在印度尼西亚的追随者的思想完全沒有相似之处，完全不是要建立一个反动的資產階級政党而鎮压工人階級。如果我們還記得加諾兄在《在革命的旗帜下》第256頁曾写道：“我們的軍隊是真正的平民的軍隊，……一个从农民取得很多人力的軍隊，但是工人的队伍，无產階級是我們的先鋒队”，那末，这一点就更清楚了。

因此，有一个以上，一个以上政党存在并不是什么禁忌。实际上現在我們国家有十个政党，至于哪一个党当先鋒，要由人民来决定。只有为維護人民的利益和为人民的斗争的忠心耿耿的党，才能取得这种先鋒的地位，而不是根据主观願望，也不是根据什么法律或条例所能决定的。共产党人深刻地認識到，在人民斗争中不付出什么代价是不能取得这种先鋒地位的，仅仅根据工人階級及其政党必然起领导作用的历史发展規律也是不能取得这种先鋒地位的。只有在維護人民利益的斗争中表現出自己的无限忠誠、不怕牺牲和勇敢无畏的政党才能取得这个地位。

在反动派分裂民族團結的活动中，最近期間出現了一种新馬

斯友美主义，那就是他們想把神道的原則从“建国五原則”分割出来，并利用这个原則到处进行威胁，并煽起宗教狂热。他們完全抹煞“建国五原則”的核心，这个核心就是一个原則或互助合作原則，它包含着社会中的一切力量和各种思潮之間实行**革命的忍让**的意思。

民族陣綫已經而且将要起很重要的作用，同时它在我国的政治生活中将起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同样，在实现三項任务、巩固已取得的胜利、克服經濟困难和反对新殖民主义的斗争中，民族陣綫也能够起很大的和积极的作用。

(二)关于克服經濟困难的任务

在談到第二个任务——克服經濟困难——的时候，首先需要先談一下有关国家經濟情况的几个方面。我們扼要地分析一下以下几个方面：**(甲)关于国家財政；(乙)关于生产；(丙)关于对外贸易；(丁)关于人民的生活費用。**

(甲)关于国家財政

临时人民协商會議确定，金融稳定是建設中很重要的因素。在各个有計劃的建設阶段中提高各部門的生产是主要的目的。国内必需品的流通問題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問題取决于生产的发展。金融的稳定取决于生产的发展，反过来，財政不稳定又会破坏生产。这就是說財政政策必須为生产服务，而不能执行其目的不在促进生产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反而牺牲生产或者使生产更加恶化的錯誤的財政政策。事实证明，总统的財政方面的助手沒有成功地执行这样的財政政策，也沒有执行临时人民协商會議所作出的稳定金融的决定。

苏加諾總統曾提到，为了解放西伊里安的斗争，在执行人民的三项命令和消灭“印度尼西亚共和国革命政府—全面斗争约章”集团和伊斯兰教国运动—印度尼西亚伊斯兰教军等反革命分子，需要有足够的经费，这是正确的。这一项政治任务必然要影响到财经方面。但是，经营管理不善使经济和财政恶化，这也是事实。在执行人民的三项命令的时候，不应当，也不容许发生这种情况。那些经营管理不善的人错误地利用人民的三项命令为自己谋求利益。因此，在坚决贯彻苏加諾總統在泗水作的关于“胜利年”的报告和关于人民的三项命令一周年的报告时，消灭财政经济方面经营管理不善的现象，这是十分重要的。

显然，目前在国家财政管理上不能保证效率，所以在使用上未能防止浪费现象。这些结果都可以从社会中看到。关于国家财富使用不当的消息，现在越来越多，而没有传开的一定会更多。财政方面的管理不善，除了浪费以外，主要的还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上级有关机关的监督没有起到应起的作用。更不可能进行自下而上的监督，即群众的监督，也就是政府官员所宣扬的所谓“社会监督”。仅仅以为实现民主管理而成立的企业委员会或諮詢委员会等机构这一工作来说，用苏加諾總統的说法，就进行得像蜗牛爬行一样。

(二)由于国家财政管理组织中的有效因素——配合工作没有实现，因此不能体现建设部门在国家财政分配中的优先地位。虽然有了优先发展的规定，但是在实际经费的分配中却没有体现原订的先后顺序的规定。其后果是次要部门挤掉了应该给予优先照顾的部门。

(三)国家财政收支预算，无论在经常费用支出和建设费用支出方面，都还没有贯彻执行《政治宣言》。这就是说国家财政收支

預算沒有体现根据《政治宣言》而制訂的財經方案。《政治宣言》及其执行方針規定了国营經濟必須居于領導地位，但是目前的国家財政收支預算還沒有改变过去依賴直接稅和間接稅作为国家收入的性质。国家的收入不是依靠現有的国营企业或其他生产部門的收入。在解决国家收入的困难方面，仅仅采取了金融方面的技术性措施和停留在增加直接稅和間接稅的办法上，这是从社会上取得更多錢財的最簡易的办法，但却是加重人民的負擔、遏制国家經濟发展的办法。而对那些从通貨膨脹中撈取了大量利潤的人却一点也沒有触及。稅收政策不是根据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原則，相反地，通常是取之于人民而流进了官僚資本家和新暴发戶的口袋。

(四)應該成为国家收入的主要来源的**国营企业**（**国营企业和国营貿易公司**）還沒有起到应有的作用，相反地，由于这些企业把貸款大量地用在非生产性的支出上，以及經常的鋪張浪費，而仍然成为国家財政的負擔。所有这一切，根本原因在于严重的經營管理不善。

印度尼西亚盾的价值一年年地急剧下降。购买食物时，盾值只有原来的百分之二十四或者是下降了百分之七十六。以一九六二年十一月底雅加达的食品物价指数和一九六二年一月初比較，已經增加了三点二倍，而同期工資平均只增加百分之三十，相形之下，劳动人民的购买力大大降低了。

根据上述金融的現實情况，有必要在財政方面采取如下各項根本的和技术性的經濟措施：

(一)国家收入必須依靠生产、運輸和国内外貿易部門的国营企业（国营企业和国营貿易公司）的加强經營管理。通过在經營管理方面对人事和机构的整頓和整肅，提高生产能力或提高生产水平，以期增加国家的收入，而不是通过提高价格和稅率的办法来

增加国家的收入。

(二)直接稅和間接稅收入的增加,不應該通过提高稅額,而應該是通过正常的經濟发展。商业部門的稅收應該根据商品的銷售量征收。公司稅應該通过生产水平和生产能力的提高而提高。关于增加人民負担的其他稅收,如超額利潤稅、成本稅等,必須廢除或予以降低。

(三)必須通过开发最长在一年以后就能立即投入生产的自然資源的途徑作为新的收入来源。例如海上捕魚业、林业、玉米或烟草种植业等。

(四)控制外国石油公司(美孚石油公司、德士古石油公司和壳牌石油公司)的外汇收入,从而弥补外汇的不足。这就是說應該像对待种植业、工业等方面的外国企业一样来对待外国石油企业,除非是政府分配的准予轉移的利潤和服务費等外汇外,一律不得自己掌握外汇。

(五)国家的支出應該根据优先发展建設的原則尽量有效地使用。盾或外汇基金的分配必須符合上述先后順序。

(六)为了逐步解决通貨膨脹,貨幣的流通必須要有計劃。这就是說发出的貨幣必須以更大的产值来平衡。在这个問題上,必須根据**貨幣和商品的相互关系**的原則,貨幣流通量不應該脱离社会所需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供应。

(乙)关于生产

人們已經足够地了解 and 体会到,农业、种植业、矿业和民族工业的生产一般說来对印度尼西亚經濟的发展起着多么重要的作用。

从长远来看,这种作用对于印度尼西亚經濟将摆脱对外国帝国主义經濟的依賴性还是仍然保持着殖民地和附屬国的性质这一

問題是具有決定性的。換句話說，增加生產的政策應該是為了我國經濟的獨立和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我們必須繼續為爭取把殖民地經濟變成以農業和農場為基礎和以工業為骨幹的獨立的民族經濟而鬥爭。這一鬥爭有助於徹底實現一九四五年八月革命要求的政治鬥爭。

短期的國民生產的作用是很重要的，它像精確的晴雨表一樣，可以用來衡量我們為把殖民地經濟變成沒有依賴性的民族經濟而進行的鬥爭已經達到了什麼程度。如果對各部門的生產下降採取漠不關心的態度，對工人階級加以責備，甚至實際上採取了使目前生產狀況更加下降的行動，而只高喊八月革命的目標、印度尼西亞的社會主義社會以及公正和繁榮的社會，那就無非是講空話而已。蘇加諾總統在《革命—社會主義—領導》中說得很對：“……生產、經濟是國家的命脈，因而反動派經常集中破壞國家這一命脈。”

因此，漠不關心的態度，責備工人階級的態度或者使目前生產更加下降的行動，就是意味著直接或間接地、自覺或不自覺地幫助了帝國主義者及其走狗國內反動派的破壞工作。

相反地，如果我們能夠在質量上和數量上使生產水平得到一定程度的提高，降低生產成本，創造發展生產力的條件，總之，假如我們消滅了在生產方面形形色色的經營管理不善的缺點，同時消滅在分配、交通、財政等方面經營管理不善的現象，這就意味着：

（一）具體實施了短期的衣食綱領；

（二）協助國家穩定金融狀況；

（三）一方面大量地節省外匯（假如能夠停止大米的輸入和減少其他消費品的輸入，尤其是紡織品的輸入的話），另一方面增加生產和輸出現有的主要原料，並輸出國內多餘的商品以擴大輸出品種，來增加外匯的收入；

(四)为把殖民地經濟变成不依赖于外国壟断資本主义經濟的独立、自主的民族經濟的斗争取得胜利奠定巩固的基础。

近几年来，几乎所有的生产部門的状况都呈現着一幅十分暗淡的景象。

政府本身在最近的互助合作議会上证实了这样的結論：“一九六二年的生产趋势是下降的，甚至是朝着崩潰方面发展的，尤其是國內消費品的生产和出口产品的生产。”

这一結論是对的。各生产部門的生产一般地說都比上一年下降，而只有一、二个生产部門的生产是“稳定”的或者稍有“上升”。从必須充分發揮全部生产能力的角度来看，我們的生产的确面临着崩潰的危險。經營管理不善的現象随处可见，統計工作和有关主要原料的生产数字的搜集工作也是如此，因此确定产量的时候，不能仅仅根据官方的正式統計数字，还應該估計活生生的现实，尤其應該估計到生产实践方面的因素。

生产实践中最有决定性的因素是生产的經營管理，它是由人和組織机构組成的，而人終究是最重要的因素。能否利用自然資源和現有的生产資料为社会創造有用的物資，取决于作为管理者和直接参加生产的劳动力的人。如果經營管理者对生产經營管理不善，生产就会下降而生产成本却很高。結果加重了作为消費者的人民的負担。

此外，目前生产下降和走向崩潰也是由于大量的貪污、浪費和走私所造成的，这是一种具有破坏性和十分反动的經營管理不善的現象。

在这里只举出四、五种最基本最主要的生产就容易证实以上指出的关于数字混乱和生产下降的情况。

十多年来由农业部(現在改为农业和土地部)管理和領導下的